

党领导下第一个新民主主义城市政权的诞生

□ 许宝健

石家庄是我们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，被誉为“开国第一城”。石家庄是我们党进京赶考出发的地方，被誉为“赶考出发地”。石家庄还是我们党领导下第一个新民主主义城市政权的诞生地。1949年7月21日至8月9日，在全国尚未全部解放的情况下，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成功召开。当时的《人民日报》称赞大会“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”。

（一）

1945年，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了对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，就是先于近期召开“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”，今后召开“人民代表大会”“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，选举政府”。

“人民代表大会”和“人民代表大会”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却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毛泽东在《论联合政府》中指出，未来新中国的政治制度，应该“采取民主集中制，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，选举政府”。针对当时准备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，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强调，这种民意机构的“代表不是普选的，是由军队、政府、民众团体选派的”。而人民代表大会则需要调查参选人年龄、有没有选举权，再经公民按照普遍、平等、直接、秘密投票选举产生。周恩来对此的解释更加明确：将来人民代表大会，是要经过普选方式来产生的。但这对中国现在的情况来说，是非常困难……现在凡是通过普选方式产生出来的会，我们叫做大会，例如人民代表大会。凡是通过协商方式产生的会，我们就叫做会议，例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

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会议最大的不同，是代表产生的方式，前者由普选产生，而后者则由协商产生。那么越过人民代表会议直接

召开人民代表大会，对石家庄来讲，条件和时机是否成熟呢？按照后来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的规定，凡在军事行动已经完全结束、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、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方，即应实行普选，召开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。石家庄于1947年11月解放。之后，一方面大力抓好恢复生产，保护和发展工商业，维护社会稳定；另一方面建立人民民主政权。他们最先考虑的是组织临时参议会，又拟召开临时人民代表会议。随着形势的变化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全体市民经过一年的努力，已经具备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各方面条件。

（二）

1949年4月2日，石家庄市公布了代表选举办法实施细则，有“总则”“选民审查及登记”“选区之划分及选举事务之办理”“候选人的提出及竞选”“选举及当选”“选举规则”和“附则”共7章，其中规定，凡在本市居住之国民，年满18岁者，除患神经病及褫夺公权者外，不分阶级、职业、性别、民族、宗教、信仰、财产与教育程度的差别，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。这一规定表明，只有两类人失去了参政权利，其他人都有权参与选举，也有权被选举。这不仅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先河，而且把人民民主的成色体现得更加充分。

在解放不久的大城市搞民主选举，老百姓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，为此石家庄市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动员。党员干部深入到各个选区，“在选举进行的每一步骤中都紧紧与群众打成一片”，群众的参与热情很快高涨起来。

按照选举办法，代表分为区域代表和团体代表。区域代表完全由普选产生，并真正落实由选民“直接、平等、普遍、无记名、秘密式投票法选举之”。市委、市政府的领

导和各部门负责人被分配到选区，和普通民众一同参选。最后，各区以高于74%的投票率共选出62名区域代表。加上10个团体产生的68名团体代表，共有130名代表。

从构成来看，这130名代表中，公营企业职工、私营行业工人、店员、农民、革命军人、革命职员、工程师、技术人员在内的“工农兵”103名，占到79.2%；工商业者11名，占8.5%；手工业者、自由职业者、学生及其他阶层共16名，占12.3%。为了平衡各阶层代表人数，另外增聘30名代表，这样工农兵代表比例相应下降，工商业者的代表份额显著上升。这一调整说明，石家庄市民主实践不仅仅是选举民主，而是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的民主实现形式，这种探索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。

1949年7月21日，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幕。开幕当天并不是作政府工作报告，而是由26名代表和两位来宾上台发言。一位工商业代表在发言中说，“这个大会在石家庄是第一次，在全国是第一次，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。是真正代表民意的大会”。一个又一个发言在会场上下引起共鸣，大会的气氛十分热烈。

第二天，副市长臧伯平作政府工作报告，讲了包括“恢复与发展生产”“支援战争”“财政收支”“建政”“文化教育”“市政建设”“公安司法”“今后工作”8个方面。7月24日，市长刘秀峰在大会上作了《目前形势与石市施政方针和今后工作的报告》，也讲了8个方面的工作，长达26000多字，大会用3天时间进行讨论。

大会在准备期间就高度重视代表的提案工作，共收到481份提案，内容涵盖各个领域，其中市政建设的数量高居首位，而文化教育类的紧随其后。由于提案讨论时间延长，又陆续收到了100多份提

案，有的写在小纸条上，有的写在烟盒上。

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政府委员，组成人民政府。竞选当日，共有66人次为推选自己信任的候选人而上台发表演讲。大会投票选出25位市政府委员，组成石家庄市政府委员会。有的代表说，“过去是刘市长，现在还是刘市长，但现在是我们自己选的了”。

大会在结束前通过了《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与本市施政方针和今后工作的决议》等13个决议。此后在不到两年时间里，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5次全体会议。

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引起了广泛反响。《人民日报》在9天内连续刊发12篇报道，称大会是一个民主的事业成功的大会。1949年10月30日，毛泽东批转《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的报告》，指出：“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……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。”

（三）

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经验。

第一，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。大会召开前，成立了大会党组，提前一天召开预备会议，选举产生了19人的大会主席团。第二，充分体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。大会代表来自各个阶层、各个行业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，正如当时《人民日报》报道所说，“石家庄市的人们都卷入了这个巨大的民主浪潮里”。第三，建立了规范的制度和程序，具备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形态。从大会筹备、会议程序、会议功能以及民主理念、建政纲领等多方面来看，都成功将我们党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伟大构想付诸实践，为正式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
东北局南下干部的纪律建设

□ 李 波 赵 巍

1948年10月28日，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，作出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》，分配给东北的名额是一万五千人，要求“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、训练和提拔干部”。中共中央东北局（以下简称“东北局”）对于此项任务高度重视，严格部署落实东北地区南下干部选拔、抽调和培训工作。在东北南下干部大队组建、培训、使用过程中，始终高度重视加强革命纪律性，这为南下干部顺利完成任务使命提供了重要保障。

在选拔抽调时重视政治标准

南下干部选拔工作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。除了从现有各级政权的关键岗位中直接抽调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外，还抽调城市可靠的积极分子、工人、职员、知识分子及学生等，另从内蒙古地区抽调300名政治可靠的干部以应对民族工作任务。合江省（东北地区旧省名）要求各级党委选拔政治可靠，经过战争或土地改革工作的考验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。哈尔滨通河县从区（营）级序列选拔南下干部，要求参加选拔的干部必须满足年龄20岁至25岁，有至少两到三年的革命经历，未婚或能够不带家属工作，有坚强党性和独立工作、战斗能力等若干条件。这就保证了南下干部首先具备较强的政治素质，同时兼具一定的工作能力和良好的身体状况，能够妥善处理家庭问题，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异地工作当中。

选拔抽调期间，由东北局组织

部门以及各省、市委和南下干部工作队党委对拟抽调南下的干部进行了多次审查。抽调干部入关的工作开展时，迅速东北行政区划重新调整，部分地区的工作在仓促中做得不够完善，少数干部理想信念有所动摇，出现趁工作调动贪污公款物资、闹名誉闹地位或提条件提要求等问题。东北局发现这类情况后，立即通知有关省、市委停止工作调动流程，按照违纪违规情况加以处分处理。对于那些犯有错误，但已被选入南下干部队伍或者已经南下的干部，东北局也坚决对其做出处理，并且将材料送交派往机关，严格组织手续。

在整训组建中注重纪律建设

东北局对拟抽调南下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中整训，以统一南下干部思想观念和政策法规，提高纪律意识。集中整训中的授课内容十分全面，既包括党的基本理论，如七届二中全会决议、党的组织纪律等，又注重对时事问题的讲授，还包括关于实际工作问题的培训，如党的减租减息政策、城市工作政策及行军纪律等。此外，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东北解放战争经验、东北土改经验、江南地区情况等方面的培训。这些内容兼顾政治理论和业务实践，特别是预先介绍了派往地区的实际情况，确保南下干部经过集中整训后，能够严格按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开展工作。东北局对所选拔的干部还进行军事化训练，既提高了南下干部的身体素质，也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纪律意识。

东北局南下干部严格遵守组织纪律，根据组织安排参加新区工作。东北局对这批干部的任用安置有系统全面的考量，拟分配到省委、地委、县委工作的干部，从1945年抗战胜利后即进入东北，全程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，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丰富的革命斗争及解放区建设工作经验；分配到区一级（时为县、村之间的一级政权）的干部多数是在解放战争期间由关内调往东北的，在基层工作中经受锻炼，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下开展工作。东北局对南下干部按照省、市、县、区各级机构需要配备完毕，并且对每个干部的任用都提出了针对性意见，供接收单位参考。最终派往南方的干部，基本都是严格按照这些安排落实工作岗位的。

在南下工作中严格遵守章守纪

东北局选拔和训练的这批干部，前后累计有6038人，共9个大队随军南下开辟新解放区。其中老干部2122名，包括省级43名、地级88名、县级610名、区级及以下1381名。1949年春夏，全国革命形势发展迅速，江西大部地区陆续面临解放，急需大批干部赴赣工作。到1949年6月26日，东北局南下干部尽数抵达江西，除抽调千余人到广东等地工作外，其余都留下来参加江西城市接管和政权建设工作。

初到江西时，由于部分地区尚未解放，南下干部大队暂驻南昌待命。勃利县南下干部进入宜春县城前，特意在距离县城不远的下浦乡停留至晚上，直到晚上10点才整队进城，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影响群众

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。同时，上级还要求干部进城时注意形象风纪，尤其不能参加欢迎宴席。尽管上级要求免去群众的欢迎仪式，但干部入城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，热情的群众早早涌上街头，敲锣打鼓迎接远道而来的干部，有的县里各界人士还提前准备了宴席。南下干部们致谢时都备有枪支防身，以随时应对反动武装的突然袭击。进行土地改革时，南下干部们克服生活饮食、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，住到贫苦农民家中，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，迅速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，使土地改革工作得以顺利开展。

得益于贯穿始终的纪律建设，东北局南下干部历经长途跋涉，全程秩序井然，充分展现了党员干部的精神风貌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他们严格按照组织分配到岗工作，被分别派往九江、袁州、赣州、抚州等6个地委、专署和分区，以及南昌、吉安、萍乡等城市，迅速充实了江西的干部队伍。在江西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中，南下干部积极参与组织剿匪反霸，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物价、接管企业码头，妥善安置旧职员，稳定社会秩序，推进生产恢复与发展，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历史性贡献，很多干部从此扎根在了江西。



龙口抗日烈士纪念碑矗立于山东省龙口市振兴中路东侧，系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为纪念收复龙口和抗日战争牺牲的烈士由民间捐资修筑。塔身呈四方立体形，高10米，底座周长18.9米。纪念碑正面镌刻“抗日烈士纪念碑”朱红大字，背面镌刻着74位烈士英名，左侧为北海军分区司令员孙端夫和政委刘中华题词：“海染波山绿，以示解放大愿；血洗国土红，而昭卫国忠诚。”右侧是龙口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王佐群撰写的碑文，全文如下（标点为引者所加）：

溯自倭寇侵境，异俗起兵，纵蜚尾以兴妖，恣狼心而蛮横，生灵荼毒，妄意鲸吞。时所谓捍国之兵，闻风远逃；军阀、官僚，遁迹匿形。由是而国土变色，民族遭辱，民心惶惶无所依从。幸赖中国共产党振臂高呼，号召自卫。热血志士，鏖（崛）起应声，操枪荷矛，蜂集云拥。原皆工农子弟，谁识战策兵机？今则习武从戎，竟成国家干城。抱必死之决心，出没于枪林弹雨，坚胜利之热望，终制火灭烟消。阉宦皆得安居乐业，莫不欣欣以悦容。歌颂之声，无处不扬。是故，每战前仆后继，与敌搏斗，舍入出生，八年一辙。忠心耿耿，实空前未有；艰苦卓绝，克服困难如山。兹我特区机有午塔、甲刘家、圆壁张家、大吕家及此次解放龙口等战斗而殉国烈士、被难同胞，血染通海，尸卧长街，拼头颅抛热血，谁不为大义所感，忠勇所激！如此壮举，不惟我军民之所佩服，即使敌人亦尽皆丧胆。今际龙口解放之后，特区党政军民谨筹大会追悼、表扬，显允遗志誓继，血债索还。烈士得瞑目而志畅。志碑永垂，以鉴后世，轰轰烈烈，万古流芳。

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
龙口特区党政军民企立

碑文生动记述了龙口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抗击日寇的英雄壮举，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，展现了继承先烈遗志、赓续英烈精神的壮志豪情，读来令人动容、催人奋进。

北海专署：党领导下的山东省第一个专区级抗日政权在此诞生

龙口，旧称黄县，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，自古有“金黄县”之誉。七七事变之后，国民党驻黄部队和官吏闻风而逃。国难当头之际，黄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抗日武装，承担起民族救亡大任。1938年1月30日，黄县抗日救亡团在城南黄格庄举旗，建立起党领导下的黄县第一支抗日武装——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；同年8月15日，党领导下的山东省第一个专区级抗日政权——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（简称北海专署）在黄县建立，曹漫之任专员兼黄县县长、孙端夫任蓬莱县县长、于娘任掖县县长。北海专署的建立，使蓬、黄、掖三县抗日民主政府有了统一的行政领导机构，标志着胶东第一块抗日根据地——蓬黄掖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形成，计有人口163万，面积3177平方公里。北海专署成立后，组建了胶东北海区保安司令部、接管了海关、建立了高等法院北海分院、创办了胶东公学，诸多举措，团结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，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，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抗战斗志，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。

图杨家：胶东第一个兵工厂在此孕育

1938年3月，第三军第三大队为有效解决抗战武器不足问题，决定在黄县

海染波山绿 血洗国土红

——山东龙口抗日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

□ 刘中兴

南部山区的圈杨家村建立兵工厂，制造、维修枪支弹药。5月，中共胶东特委和第三军总部到达黄县后，将第三军总部修械所并入圈杨家兵工厂，后又将蓬莱修械所和掖县修械所相继并入，直属第三军总部领导。到年底，圈杨家兵工厂已初具规模，工厂已有职工500多人，机器设备50余台，每月可生产七五、八二迫击炮十几门，七九步枪上百支，炮弹300余发，地雷200余个，手榴弹5000余颗，复装子弹近万发。1942年1月14日，兵工厂的十几名同志和县政府、县大队等300余人在慕院乔遭敌偷袭。危急时刻，县大队副大队长李玉玺一面率队阻击，一面命令孙彩云、史兴成、史梦朋等人带队突围。为给突围的干部群众创造条件赢得时间，李玉玺主动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去，但寡不敌众，李玉玺等27名同志在此役中壮烈牺牲，他们的名字永远留在了黄县人民的心中。

《大众报》：中共胶东特委机关报在此创刊

为更好地宣传、组织、发动群众抗日救国，1938年8月13日，中共胶东特委以第三军政治部领导的联合出版社为基础，在黄县城南的古刹莱山院创办了《大众报》。报社分编辑部、印刷部、经理部和电台，报纸为四开四版，编辑部设在姜家店村，印刷厂设在莱山院庙里，贺致平任社长，李研吾任总编辑。同年底，胶东特委改为胶东区党委，《大众报》遂成为中共胶东区委的机关报。抗战胜利后，《大众报》于1946年4月1日改版为对开四版大报，设有8个专刊，胶东各区、县都建立了《大众报》发行网。1948年12月1日，为了突出报纸的地方特色，同时也为了区别于山东分局机关报《大众日报》，更名为《胶东日报》，1950年4月20日因全国行政区划变动，随胶东行政区撤销而停刊，共计出刊2869期。《大众报》作为胶东抗日根据地创办的最早的党报之一，前后出刊12年，面向800万胶东人民，发行量达10万份，有效宣传了党的政策主张，是抗战时期胶东文化光芒四射的灯塔，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组织人民、动员人民的巨大作用。

抗战胜利后不久，我军发起收复龙口进攻，军区战斗模范程日兴等37名同志壮烈牺牲。1945年8月19日上午9时，龙口在北海独立团勇士们的浴血奋战下胜利收复，这座沦入日军魔掌6年零5个月的小城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。

为了新中国——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

